

一生与《史记》结缘的“大先生”

——记三秦楷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第一线”“我这一辈子就研究《史记》了”……他用一生读《史记》、讲《史记》、研究《史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的高尚品格，以最朴素的报国情怀守护中华文脉，用丰硕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他是受人尊敬的“大先生”。他就是三秦楷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张新科。本报记者 张彦刚 摄

老师的一本赠书 让张新科与《史记》结缘

冬日里走进张新科的工作室，他正和自己的博士生研讨课题。办公室大量与《史记》有关的书籍资料，摆满了几张书桌与几个书柜，这是给记者最为直观的印象，这些“宝贝”也是张新科最为珍视的物件。头发花白，谦虚、温和，是记者见到这位可敬学者的第一印象。

2000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将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天文地理、文化思想、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写进了不朽的《史记》，成就了“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年轻学子，张新科时常被司马迁在逆境中不屈的进取精神和高尚品格所打动，入校不久便对《史记》产生兴趣。张新科说起自己与《史记》最终结缘，并成为之后近40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时说：“是我的老师赵光勇最初送我的那套《史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是他的带领让我走上了研究《史记》之路。”

要为中国人在《史记》研究领域争口气

采访中，张新科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业界有个说法，说《史记》是中国的，但“史记学”在日本。因为日本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史记会注考证》走在整个国际学界的前头。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一批中国学者就策划组织成立司马迁研究会，给陕西、给中国争一口气。

从学生时代起，张新科就跟着老师们为成立司马迁研究会奔走。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以后，决定出一部《史记研究集成》，取代日本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史记》研究的第一线。从1992年策划启动，到2020年一部560余万字《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正式出版，陕西三代学人历经了30年，在全国乃至海外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

张新科说，这些年来，自己的研究在理论建树上形成了一些特色。

1990年第一本《史记研究史略》出版之后影响巨大，这是第一部《史记》研究史。1995年又出版了《〈史记〉与中国文学》，后来又增订出版。影响比较大的是2003年出版的《史记学概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史记学”的框架结构。2021年出版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被列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并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1986年，张新科以优异成绩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启了《史记》研究征程，如今研究成果斐然。提起司马迁和《史记》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同时提起张新科，《史记》研究界几乎无人不知。他以《史记》研究为中心，拓展到整个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学术成果丰硕，与全国学者一起共同努力，让《史记》研究的重心重回中国，实现了几代学人“为中国争一口气”的夙愿。



张新科(中)与学生在校内交流。(陕师大供图)

做学问要惜时如金 要坐得住冷板凳

来到张新科的工作室，学生们总能看到他在书架前的身影。年复一年，留存在这里由张新科研究整理的资料卡片、满是批注的书本、一摞一摞的稿纸，如今依然是学生们翻阅的重要资料，这也是张新科在学术领域攀登的实物证明，见证了他培育学生的辛勤付出。

据学院的同事回忆，张老师年轻时条件艰苦，住在老旧的“筒子

楼”里，三伏天，热了就用凉水洗一把脸；三九天，冷了就用煤炉子取暖。为了研究《史记》，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张书桌，如今还有很多人能清晰地记起张老师挑灯夜读、笔耕不辍的一个个夜晚。

据研究团队成员回忆，张老师近些年患重病住院及手术治疗期间，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但凡有点精力，都要规划和推进《史记》

研究课题，每周和团队成员线上讨论时，对病情只字不提，收到来自张老师的信息，全是关于学术、文稿和项目的。他的病床床头时常摆放着厚厚的《史记》研究书籍和资料，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斜靠在病床上，与学生交流学术课题。张老师时常念叨：“做学问要惜时如金，要踏踏实实，要坐得住冷板凳。”

用丰硕的研究成果传播中华文化

采访中，张新科对记者说：“《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史记》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史记》中蕴含诸多理念和智慧，对于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仍有很深的借鉴意义，《史记》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想用自己的研究，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读懂中国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近些年，张新科发表的《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一文，展示了《史记》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代价值。他主编的《〈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深度挖掘了《史记》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借鉴作用，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丝路书香”外译项目，他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些著述以俄文、英文出版发行，产生

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张新科先后组织编写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图书《全注全译本史记》、“新时代万有文库本”《史记》，以及“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既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要让国内学者看到国外学者如何解读诠释《史记》。他担任加拿大《文化中国》刊物学术委员，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做人做事做学问 做甘为人梯的“大先生”

课比天大，是学生们对张新科的最深印象。“基础要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这12个字是张新科的学术准则，也是学生们听得最多的话。

张新科的博士毕业生，如今已经是副教授的刘彦青对记者说，近几年，张老师因病不得不停下了教授本科生的课程，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研究生上，只要身体允许，他一定会给学生上课或者修改论文，确保每一位学生学有所成。

刘彦青说，张老师为了每个学生能早日成才，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学术资料放在师大长安校区老师办公室内，只要学生有需要，就可以随时到此翻阅。

刘彦青回忆说：“2019年张老师第一次手术出院后不久的一天，我到张老师的长安校区办公室翻阅资料，早晨9点多打开办公室门时，发现张老师已在此翻阅相关资料多时了，他正为10点钟给学生的一堂课进行准备。后来才知道张老师在拖着虚弱的身体，早晨7点多就乘坐校车，从雁塔校区早早来到这里，开始了课程准备。”

当年，团队成员得知张新科瞒着他们做了大手术，不禁感到心疼、难过。刘彦青想去医院陪护老师，却被张新科赶了回来，张新科说：“生病是我自己的事，大家不要因为我的病情，耽误研究进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意义》就是在他住院治疗过程中结项的。

多位学生说，张老师虽然在《史记》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并不希望学生将研究目光



张新科早年辅导学生。(陕师大供图)

局限于此。只要是有新意、有价值的选题，他都鼓励学生大胆探索。正是这种宽厚包容的师风，使他们门下弟子的研究除了“史记学”之外，更广涉诗歌、辞赋、小说等领域，并与历史、哲学甚至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态势。每当学生做课题遇到困难无法找到答案时，只要和张老师聊聊，张老师总会给学生介绍一些文献和书籍，帮学生整理思路，学生们总能从阅读研究文献中，找到破解难题的答案。

张新科从教近40年，共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100余位硕士生、30余位博士生。他始终恪守“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无小事”的从教信条，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在教学中严于律己，在科研中孜孜以求，用初心、恒

心、责任心、上进心、关爱心与反思心为内涵的“六心”标准来鞭策自己、教导学生，助力每一位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

近年来，张新科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5门课程被评为国家一流课程，主持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两项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任文学院院长期间，陕师大的“中国语言文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22年该学科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期，成为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的中坚力量。

本报记者 张彦刚